Published in: Jia, Wenjan et al. (eds.): Sprache als Brücke der Kulturen. Sprachpolitik und Sprachwirklichkeit in Deutschland und China. Beijing: fltrp.com, 2015. Pp. 168-184.

德语规范化和标准化[1]
——长史简述

Ludwig M. EICHINGER
德国曼海姆德语语言研究院

德语规范化的特点在于不存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某个中心的语言——也不曾存在过这样的中心。与此相反，人们必须寻求一种平衡，使得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拥有书面语和跨地区需求的社会能够运转。在 19 世纪具有市民特色的语言世界统治公共场所的时候，书面语达到了这种平衡状态。至于口语，直到 20 世纪中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才使得一个统一的规范性观念被广泛接受。

标准化的重要阶段与德语国家的巩固密切相连。德语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标准化的是正字法——尽管一直存在争议——，如词汇这些核心领域或者语法中模棱两可的问题在其适用的范围内，更确切地说在公众讨论和大众媒体的实践中，得以协商并且变得清晰。

恰恰因为标准语包括其口头形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广泛视为公共使用的形式，所以如今人们讨论更多的是此框架中变化的可能性——也为了显示德语的地方性（“多中心”）传统。

1 译者：姚燕，北京外国语大学。Übersetzt von YAO Y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德语经历了独特的语言标准化历史。同欧洲相邻国家的语言不同，德语早期书面语的折中形式非常重要。这种形式的推行与15至18世纪深受市民影响的话语世界逐渐发展密切相关。19世纪，这种发展才首先在学校的课堂中发挥作用，后来又在政治方面产生影响，表现在德语区的民族国家采取了明显的语言标准化步骤，其原则沿用至今。由于在不同的语境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标准语，标准语在近代晚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形式，如今要继续开发一种与德语发展相应的标准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监测”这一发展便是一项中心任务。

1. 从技术上对文字的复制

1.1 标准化

语言的标准化始于书写与阅读。书籍印刷技术发明于15世纪，并从此得以推行，一个新时代由此开始，能够阅读、而且可能还会书写的人不再只局限于从事书籍印刷的专门人员。此时的重要变化不仅是人们获得了一项新的技术，更多是一种意识：现在更多的人可以了解那些之前只有专业人员才了解的内容。[2] 这是城市市民解放的开始，在城市里，市民意识到自己在各种技艺、手工方面的能力，他们具有了更强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基督教的新突破相伴相随，这个新突破就是宗教改革，它意欲让人们直接接触神旨。伴随这种独特性的还有民众语言进入公共的政治领域的现象，这体现在帝国枢密法院的成立上。[3]

1.2 媒介的标准化力量

语言的标准化形成了循环。印刷技术能够在花费较少的情况

2 详见Giesecke的论文（Giesecke，1998）。

3 这里引用的细节内容的准确数据可以查阅普通语言史，最详细的内容大概要查阅Polenz出版于1991年的著述。概述的内容则参见Polenz出版于2009年的著述。下文中有关语言史的史料也请参见这两部著述。

下生产出大批量的相同语篇。但是要让这带来效果，就必须保证尽可能多的讲德语的人理解这些语篇里的语言形式。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民众语言——德语，而不再（仅限于）是古老的教育语言（Bildungssprache）——拉丁语。这一变化也是正在兴起的市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渐渐地，这个市民世界越来越多用自己的语言记录下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它自己的语言本是德语口语，存在的形式并不统一，而是由多种地方的和地区的语言形式组成。因此，这个时期的首要任务便是找到一种书面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能够涵盖多种多样的口语形式，使人们能够相互沟通。[4]第二个任务则是继续普及利用该语言形式进行阅读，随后再普及书写。为此，就要把教授的内容真正标准化。随着书写普及的开始，一个相当复杂的翻译进程也开始了，即：在书写符号和人们掌握的口语之间建立联系。这证明，我们现在看到的当时最初的语言标准化书籍是正字法教科书，这些书实质上提供了语法知识方面的必要标准。[5]书写的规则和语法的某些规则性促使语言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并促使人们接受相应的标准，这种促进作用一直延续到18世纪。从一开始，一个事实就是清晰的：在词汇方面达成一个标准是难之又难的事情。时至今日，日常生活语言在词汇方面还存在传统差别，尚未统一，而在当时各门科学已经通过新的语言渐渐获得了一个新的世界，发展出自成一体的形式——连文学作品也努力用一种同其他欧洲语言相媲美、自成一体的语言进行述说。[6]

---

4 Werner Besch已在1967年详述了这个过程。参见Besch，1967。

5 参见Moulin-Fankhänel，1994。

6 详见关于阿德龙字典（Adelung’schen Wörterbuch）有效性的讨论。参见Eichinger，1990。

2. 经过启蒙后的市民的语言世界

2.1 功能精英的语言

德语标准化的核心在于书面语的形式，这个形式先被很多人接受，后来最终在大约18世纪中期为德语区的所有人所接受。[7]那么人们怎样找到这种形式，又是谁获得使语言标准化的权利呢？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获得这个权利。在德语区，几百年之久都没有一个居于统治地位、能够明确影响语言的文化中心。即使找到的这种平衡深受德语区中东部的影响，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一个折中的形式。对于这个折中形式，著名的德语语法学家尤斯图斯·格奥尔格·绍特（Justus Georg Schottel）在17世纪中期表明了意见：真正的德语并没有实际的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更多是表现为有教养的德语演说者（和书写者）之间达成平衡的一种语言形式。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导致了德语语言区北部比南部更能体现语言规范。因为经济情况的变化，德语语言区北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低地德语，而接受了新的语言形式。因此，德语语言区的北半部普及了新的语言，而不受当地言语方式的影响。伟大的百科全书式学者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研究过中文，而且十分赞赏这种语言，他在18世纪初推动了德语的发展，最终使之扩展成一种能与欧洲其他语言媲美的语言。[8]这个过程不仅限于语法和书写的统一，莱布尼茨注重将已经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德语向科学领域扩展。当时，一些技巧被系统性地创造出来，借助德语中的构词手段和处理“外来”词的方式，很多科学领域中的词汇得以拓展。

---

7 与此相关的重要时间可以说是1759年，当时成立了巴伐利亚科学院（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这是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机构，它接受了格切特（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主张的德国中东部的语言规范。参见Eichinger，1994。

8 参见Eichinger，1990。

2.2 启蒙语境中的言说

尤其是18世纪后半叶，出现了现代世界的各种语篇形式，涵盖从私人函件到最抽象的科学著述等丰富的语篇类型，私人函件的代表形式是书信，抽象的科学著述则以康德使用的德语为最——虽然这个时候的贵族还使用法语谈话，康德却使用德语书写。不能忘记的还有一点：18世纪末，伟大的古典主义文学家使新形成的德语标准语充分施展出其美感，如歌德、席勒，做到这一点的还有后来的古典主义科学家，如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他通过对比德语与包括中文在内的亚洲语言，强调语言内在禀赋和特性，由此也强调了德语的特征。

3. 民族形成和民族国家

3.1 开放和传介

到18世纪末，学者之间达成平衡，形成了语言的标准。到19世纪学校体系容纳了所有民众时，这个语言标准就真正发挥了作用——这些规范通过教科书得到传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阅读，除了从书信到文学作品等传统的阅读性语篇，报纸的影响力在19世纪急剧扩大，大大促进了人们对标准语的接受。渐渐地，标准语越来越多出现在口语中，比如那些受教育较少的民众群体也能在协会中学习如何在公共场合讲话。这显然并非直线发展的过程：广大的民众阶层在口语和新的标准语之间发现一条语言路径，让他们走近类似“高地德语”的语言。同时，德语作为科学的语言经历了巨大的飞跃发展，德国的教育体系和大学被视为楷模，书写语言也由此得到广泛传播。[9]

3.2 民族、国家、规范化

规范化超出用于满足功能的标准化之外，就总会内含一些政治

9 详见Osterhammel，2009，第1132-1133页。

性的因素，这尤其适用于德语的规范化。19 世纪，德语区里共同的语言所产生的政治性教育作用比其它因素得到更多的强调。在经过一系列政治动荡之后，德语国家的形式渐现轮廓。1871 年，普鲁士主导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政治和社会综合发展，使规范化迈出了决定性的步骤。当时提出了很多创意，以期在帝国实行统一的正字法。尽管正字法的实行持续到 20 世纪初，准确地说，到 1901 年官方才能最终实行正字法，[10] 但是至少人们努力使发音规范化，以利于在公众场合的交流。但是，发音的规范化没有像书写规范化在学校中得以系统传授那样广泛实行。公共言语方式在词汇方面也得到规范：引入了邮政和铁路方面的德语概念，而在此前，这两个领域的概念深受法语或英语的影响。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中的生活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越来越重要。虽然经过标准化的语言平衡形式还会显示出其他的表现形式，但城市生活促进了语言平衡形式广泛传播。

3.3 大众媒体作为规范的管理者

另外人们还可以看到，媒体在整个 20 世纪如何促进人们逐步熟悉了标准语：广播在 1923 年开始在德国传送节目，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广播的覆盖面急剧扩大，这是第一个让人们通过听的方式来学习跨地区口语标准语的媒体。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电视便是主导性媒体，它向人们展示不同情境中的语言，不仅让人听到、而且让人看到言说者之间的互动。

教育体系获得的成功、城市生活所提出的要求、在这种环境中职员职业的出现以及媒体产生的影响，这些因素使标准语至少作为书写语言和正式语境中使用的口头形式渗透社会的各个方面，尽管日常生活的言语形式仍然受到非正式的传统语言形式、特别是受到方言的影响。[11]

---

10 详见Scheuringer，1996，第60页。

11 恰当评价这些情况下互动行为的问题也体现在有关规范的讨论的常见涉及方面。参见Eichinger，2011著述中讨论的情况。

4. 标准语中的变化

4.1 规范：确立和协商

显性的规范化主要在正字法领域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掌握书写语言的形式在语言使用的社会评估方面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大约1995到2005年之间进行了关于正字改革的激烈讨论。这场讨论清晰地显示出，在书写语言方面不断提高的认识与适当的语言认同性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人们深入探讨语言标准化的问题，便可以看到，正是成功使用标准语或者使用近似的标准语，才会在近几十年中又抛出了如何以新的方式来塑造标准、并使之可以变化的问题。[12] 在这些时期中，日常的口语也接近建立的标准。结果，在观察语言标准时，人们看到了出现的典型言说语言特征，并予以考量。但是，这些特征常常与一种非正式语体有关，客观来讲，这种语体属于日常生活，而纯粹书写性标准形式实际上是没有这种语体的。

4.2 说明：多中心的语言标准

与此相应，人们在近几十年中又讨论了这个问题：传统的地区性差别和德语区国家之间的语言差别对于语言标准的确定有何意义。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已出版了一本关于国家语言变体的字典，里面列出了德国、奥地利、瑞士的标准语有哪些不同。这些国家在处理如外语影响方面的问题时遵循不同的传统，这会显示在语言使用中。[13]

---

12 详见Spiekermann，2005；参见Eichinger/Kallmeyer (Hg.)，2005中的所有文章。

13 Ammon et al.，2004；参见Eichinger，2005。

5. 语言标准化的新范式

5.1 标准形式的基础和实现

标准语深刻影响了德国的语言世界，它的成功使语言标准化的活动面临一个任务：要应对一些变化。由此而言，语言标准是一种适合于公众的语体，它在一定程度上要随着所面对公众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在实践中，其他适用于公众的语体所显示出的书写和言说形式自有一种为大众所接受的模本。这些模本自然出现在（受过教育的）公众接受以普通方式言说的内容之处。对于书面德语而言，这便是那些大型日报（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日报、新苏黎世报这一类的订阅类报纸）编辑的语篇类型。这些媒体中不仅出现中立性的书面语言，而且体现出一些标准，这些标准符合读者对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种主题的语体期望。[14] 所以，人们看到，在使用标准语的、已具有一定水平的共同体中，语言标准化大幅度实施，以期满足人们的期待：语篇不仅要具有形式规范性，而且具有语体规范性。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某些以语言和交谈为主的电视节目中，这些节目努力体现一种口语的中立语体，使标准语符合情境。

5.2 对变化的评价

德语国家的社会在几百年中发展成凸显文字文化的世界。这是一个公众话语的世界，是标准语的空间，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社会圈子和群体加入，并深受这些社会群体的影响。他们的参与表现在公民共和性社会中所具有的广大公共领域上。而且，随着标准语的广泛传播，媒体的发展还促使语言变化增多。这又使未来的语言标准化和规范化活动面临新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评价语言标准中的变化。[15]

---

14 详见Eichinger，2013，第138-139页。

15 参见Deppermann/Kleiner/Knöbl，2013，特别是第89-90页。

5.3 新的经验

5.3.1 国家的语料库

但是，就在近几年，用于观察和评价语言的基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用电子手段总括语言数据，存储、加工、分析这些数据的可能性迅速增加，这些因素的确将语言观察引入到一个新时代。书面语和口语国家语料库的建立，为观察语言的现实使用情况及其变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基础。[16]在此基础上，实时语言监控 (language monitoring) 这种新的实践得以发展，大大提高了关于语言使用、使用变化和发展趋势的观点的可信性。

5.3.2 慎用方法及规范性的优势

尽管有如此多的优点，人们仍然不能忽视一个事实：虽然人们拥有认识语言的意愿，但是不管这些语料有多丰富、分类有多清晰，自然语言的分散性特点也让人无法获得全部语言使用的“代表性”。

正是考虑到语言标准、语言标准化或规范化的问题，上述事实带来的问题还没有在全面评价语言使用时那样严重。毫无疑问，标准是具有规范性的方案，这里的核心内容是能够找出中立的公众所使用的恰当的语体。公共话语的参与者用这种语体协商出适用的规则。在我们社会现有的情况下，这些规则实质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书写形式和口头言说形式的媒体语篇形式，以及科学专业性话语、公共政治话语的形式和某些应用型和指导性语篇。[17] 显然，从某个角度来讲，学习者在书写中使用的语言形式也很有意思，因为它们直接表明在哪些地方会出现不稳定性或者困难。这类语言观察活动目前正大规模地发展，成为所谓“数码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发展中与语言相关的一个

---

16 关于德语语言研究所（IDS）的语料情况，请参见Kupietz et al.，2010。

17 参见Sandig，2006，第290页等„neutralen Stilen“一节的阐述。

重要分支。德语语言研究所（IDS）积极参与了与德语相关的这类行动，成为中心成员，但是在德语区没有一个机构直接服务于语言规范化任务，无法使德语区这一行动的实际后果反映在政策协调层面。

6．规范的变化和规范的协商制定

人们看到，保持适当的标准语言并不在于坚守曾经定下的规则，而在于观察和实施中立模式下公众互动所使用的适当语言形式。言说者会理解偏离那些与此相关的期望的行为，所以，默克尔总理在公开场合选择“这根本不行（das geht gar nicht）”这样一个旨在体现青年语言轻松特征的表述时，人们有意把它理解为非标准语的表述，因而也将它理解为一种信号。只有人们对标准语言的期望真正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上述这样一种语言信号才能被读懂。

参考文献

Ammon, Ulrich et al., 2004: *Variantenwörterbuch des Deutschen. Die Standardsprache in Österreich, der Schweiz und Deutschland sowie in Liechtenstein, Luxemburg, Ostbelgien und Südtirol.* Berlin/New York.

Besch, Werner, 1967: *Sprachlandschaften und Sprachausgleich im 15. Jahrhundert. Studien zur Erforschung der spätmittelhochdeutschen Schreibdialekte und zur Entstehung der neuhochdeutschen Schriftsprache.* München.

Deppermann, Arnulf/Kleiner, Stefan/Knöbl, Ralf, 2013: ‘Standard usage’: Towards a realistic conception of spoken standard German. In: Auer, Peter/Reina, Javier Caro/Kaufmann, Göz (Hg.), 2013: *Language Variation – European Perspectives IV.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Variation in Europe (ICLaVE 6), Freiburg, June 2011.*Amsterdam/Philadelphia. S. 83-116.

Eichinger, Ludwig M., 1990: Von der Heldensprache zur Bürgersprache. Wandel der Sprechweisen über Sprache im 18. Jahrhundert. In: *Wirkendes Wort*, 1991: Heft 1. S. 74-94.

Eichinger, Ludwig M., 1994: 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In: Brekle, Herbert E. et al. (Hg.), 1994: *Bio-Bibliographisches Handbuch zur Sprachwissenschaft des 18. Jahrhunderts. Die Grammatiker, Lexikographen und Sprachtheoretiker des deutschsprachigen Raums mit Beschreibungen ihrer Werke. Band 3: F – G.* Tübingen. S. 281-307.

Eichinger, Ludwig M., 2005: Deutsch in Österreich. In: *German as a Foreign Language*, 2005: Heft 1. S. 1-23.

Eichinger, Ludwig M., 2011: *Normprobleme, oder: Variation ist sinnvoll. Überlegungen zum heutigen Deutsch.* Stuttgart.

Eichinger, Ludwig M., 2013: Die Entwicklung der Flexion: Gebrauchsverschiebungen, systematischer Wandel und die Stabilität der Grammatik. In: Deutsche Akademie für Sprache und Dichtung/Union der deutschen Akademien der Wissenschaft (Hg.), 2013: *Reichtum und Armut der deutschen Sprache. Erster Bericht zur Lage der deutschen Sprache.* Berlin/Boston. S. 121-170.

Eichinger, Ludwig M./Kallmeyer, Werner (Hg.), 2005: *Standardvariation. Wie viel Variation verträgt die deutsche Sprache.* Berlin/New York.

Giesecke, Michael, 1998: *Der Buchdruck in der frühen Neuzeit.* Frankfurt am Main.

Kupietz, Marc et al., 2010: The German Reference Corpus DEREKO: A primordial sample for linguistic research. In: Calzolari, Nicoletta et al. (Hg.), 2010: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LREC 2010), Mai 2010.* Valletta/ Malta. S. 1848-1854.

Moulin-Fankhänel, Claudine, 1994: *Bibliographie der deutschen Grammatiken und Orthographielehren. Band 1: Von den Anfängen der*

Überlieferung bis zum Ende des 16. Jahrhunderts. Heidelberg.

Osterhammel, Jürgen, 2009: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Polenz, Peter von, 1991-1999: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vom Spät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3 Bde. Berlin/New York.

Polenz, Peter von, 2009: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10., völlig neu bearb. Aufl, bearb. v. Norbert Richard Wolf. Berlin/New York.

Sandig, Barbara, 2006: *Textstilistik des Deutschen.* 2., völlig neu bearb. und erw. Aufl. Berlin/New York.

Scheuringer, Hermann, 1996: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chtschreibung. Ein Überblick. Mit einer Einführung zur Neuregelung ab 1998.* Wien.

Spiekermann, Helmut, 2005: Regionale Standardisierung, nationale Dest-andardisierung. In: Eichinger, Ludwig M./Kallmeyer, Werner (Hg), 2005: *Standardvariation. Wie viel Variation verträgt die deutsche Sprache?* Berlin/New York. S. 100-125.